

探索

——从日本经济到贸易与环境问题

不管是在大学里，还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总是不大识时务，不爱人云亦云。在学九评时，我说不是我们不想和平过渡，是资产阶级不让我们和平过渡，所以只有进行革命战争……，有人批评我是对和平过渡抱有幻想，在“大跃进”年代，我不同意“吃饭不要钱”的做法，被批成是反对三面红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研究室的非党群众写了一张向党组织提建议的大字报，被打成大毒草；在“四人帮”横行期间，对于江青等人的言论有不同的看法，对最高指示也不理解，甚至还要与极左分子进行辩论，被好心的领导劝阻才作罢。当时，我感到困惑和迷惘。人家说我这个人工作还可以，思想不行。

……

也许是严谨治学的位育校风养成了我善于独立思考 and 认真做事的习惯，我在研究工作中也不爱人云亦云。1994年开始，我对我国外贸企业搞实业化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误以为日本和韩国等的综合商社是搞实业化、多元化的典型，把推行综合商社试点作

施用海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探索

——从日本经济到贸易与环境问题

施用海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从日本经济到贸易与环境问题/施用海著．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103-0162-9

I. ①探… II. ①施… III. ①经济—研究—日本②对
外贸易—研究—日本③环境保护—研究—日本 IV. ①F131.3
②X—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9603 号

探索——从日本经济到贸易与环境问题

TANSUO—CONG RIBEN JINGJI DAO MAOYI YU HUANJING WENTI
施用海 著

出 版：中国商务出版社
发 行：北京中商图出版物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 编：100710
电 话：010—64269744（编辑室）
010—64266119（发行部）
010—64263201（零售、邮购）
网 址：www.cctpress.com
邮 箱：cctp@cctpress.com
照 排：嘉年华文排版公司
印 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 张：28.25 字数：507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3-01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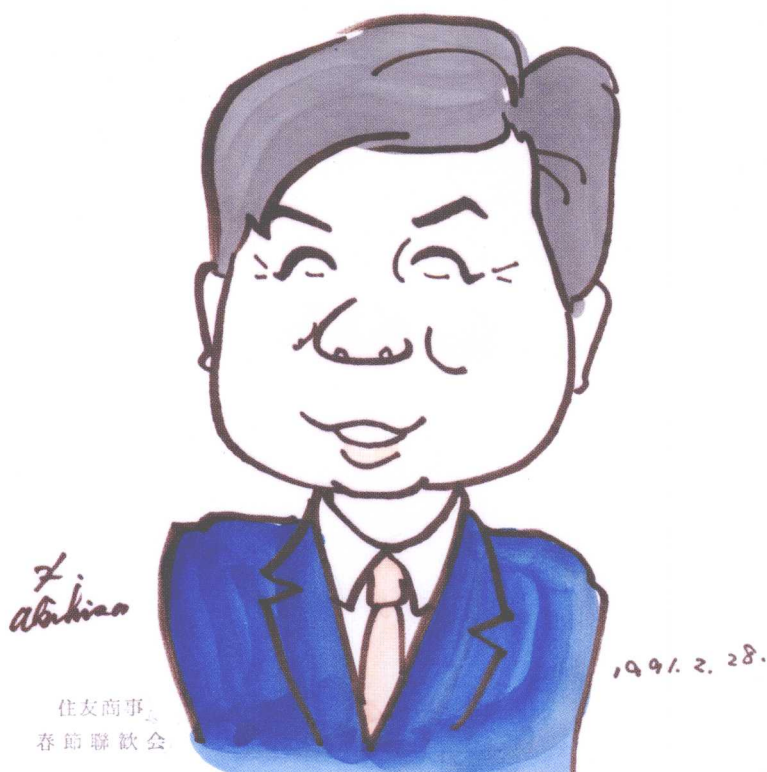
定 价：6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64242964

探索

用海



住友商事
春節聯歡會

日本漫画家为笔者所做漫画像（1991年2月28日于住友商事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及在日本的中国企业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



笔者近影。(2008年9月17日于日本东京椿山庄饭店)

海納百川有容
乃大壁立千仞無
欲則剛東系書
用海先生存念
壬申夏
植元

大连大学师范学院教授、著名书法家于植元先生赠笔者墨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笔者（右二）在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修期间，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商务参赞吴曙东（左三）及夫人周齐（左二），拜访日本全日空社长、中日备忘录贸易日方负责人冈崎嘉平太先生（左四）。（1980年于日本东京）



笔者（右）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期间，与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先生（左）合影。（1992 年于日本东京）



陪于植元先生会见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先生。左起为吕克俭（现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笔者、于植元先生、竹下登先生。（1992 年 5 月于日本东京竹下登事务所）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联络会会长黄华率团赴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全团分别拜会了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和村山富市先生。这是全团拜会前首相羽田孜（前排左五）时合影。前排左六为黄华、后排左六为笔者。（1998年9月17日于日本东京）



日本经济贸易中心会长、国际石油株式会社社长木村一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他与中国历届总理的合影。凡到他办公室合影时，都让客人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而他则要站在客人的身后。这是笔者与木村一三和我商务处的二秘孔

越（右一）的合影。（1990年5月于日本东京木村一三事务所）

笔者偕夫人（左二）应邀到木村一三先生家做客。木村一三夫人（右二）工书法，木村夫妇的独生女儿（后）善唱歌且是西洋唱法，曾在日本举办过演唱会。（1993年12月1日于日本东京木村一三宅邸）





笔者出席由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 NPO 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东京——北京论坛”时，与日方成员日本财团法人机械产业纪念事业财团会长、前日本通产省次官福川伸次先生（右）合影。（2008 年 9 月 17 日于日本东京椿山庄饭店）



与日本爱知大学名誉教授岛仓民生先生（左）合影。岛仓民生先生从中日备忘录贸易时代以来，一直为中日贸易的实务与研究辛勤工作在第一线。2004 年 7 月从日本爱知大学退休时来北京，中国的老朋友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为其举行“中日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



笔者作为中方顾问参加中瑞合作项目“可持续发展：中国和全球市场（2006—2007年）”课题总结会议。担任该项目的外方主席、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戴维·朗内尔斯先生（右）是笔者十多年前认识的老朋友，曾一起进行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2008年11月于商务部会议室）



中瑞合作项目“可持续发展：中国和全球市场（2006—2007年）”课题总结会议会场一角。（2008年11月于商务部会议室）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致以崇高的敬意

谨此授予

Environmental Award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Hereby bestows this special award upon

施 用 海

表彰您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成就
for his/he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lofty cause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for his/her accomplishm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处

The Secretariat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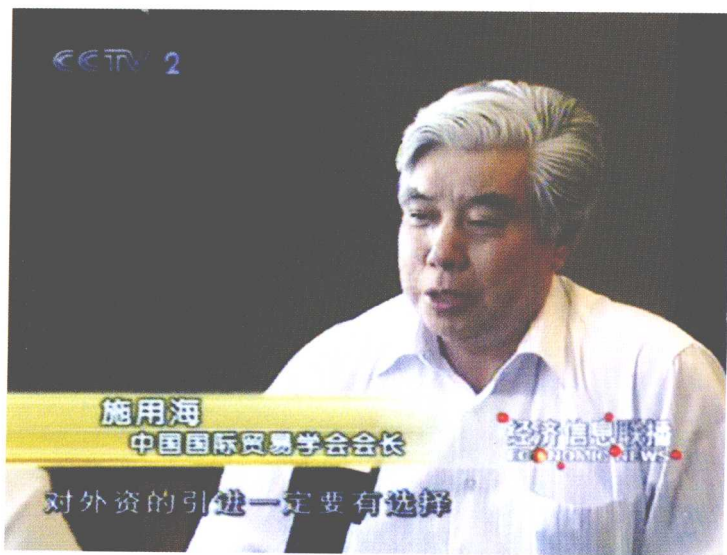
October, 2001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颁发给笔者的表彰状。笔者曾是该委员会环境与贸易工作组中方成员（1995—1999年）。正是这一偶然的经历，使笔者的国际贸易研究轨迹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从此走进了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领域。



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赴韩国出席韩国江南大学中国学院典礼。图为陈昌本（左二）、吴雁泽（右二）、厉以平（左一）和笔者（右一）。（2005年4月于韩国）

2009年8月16日，笔者应邀出席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珲春市举行的“东北亚边境贸易中心”奠基仪式，并接受了多家新闻媒体的采访。8月19日晚 CCTV2 “经济信息联播”报道了采访实况，笔者强调今后在建设东北亚边境贸易中心时，要注重“招商选资”的观点。图为 CCTV2 播出采访时的画面。





笔者任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时，在办公室阅读国际经贸消息报。（1998 年秋）

不意闯入外贸之门

(代自序)

新中国已走过 60 年的光辉历程。在她刚诞生之初，我还是一名小学生，而如今，已年逾古稀，一头白发。上了年纪的人，最容易回忆，这常使我思绪万千。

我小学毕业后，在上海肇和中学念初中，后来到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位育中学念高中。

1957 年夏天，大鸣大放。我懵懵懂懂地也“放”了两炮。一是说苏联占领着我国领土是不对的。我填了一首词，几个同学起哄，便贴到了学校的墙上。词曰：“道光诚然糊涂，尚知割地耻辱。军港海参崴，原是我国疆土。何故？何故？苏军弥漫江浦。”二是说苏联对我国的援助，不能说是大公无私的援助。理由是要我们付很高的利息。班里展开了辩论，我还从上海图书馆借来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想从中找到理论根据。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高中生没有反右的任务。后来，我仅仅是在班里的团支部会议上作个检讨就算过关了。要是在大学，只要有其中的一条，就会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我的一生就该完全是另一种景况了。

1958 年初夏，3 年的高中生活即将结束，正是选择报考高校志愿的时候。一天，我的老师俞述翰先生对我说：“你喜欢学外语，愿意不愿意报考北京外贸学院（即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那时候人们对外贸还很陌生。我原本是想报考新闻专业的，因为俞先生的推荐，就把北京外贸学院改成了第一志愿。为此，还加试了一门数学。

世上的事有时就是这样不可预料，俞述翰先生的一句话，竟然决定了我的一生。当我接到北京外贸学院录取书时，说不出是什么心情。又是 5 年寒窗，1963 年我从北京外贸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贸部行情研究所（即现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前身）工作，一干就是 30 多年。不意闯入外贸之门，我衷心地感谢俞述翰先生。

不管是在大学里，还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这人总是不大识时务，不爱人云亦云。在学九评时，我说不是我们不想和平过渡，是资产阶级不让我们和平过渡，所以只有进行革命战争……有人批评我是对和平过

渡抱有幻想；在“大跃进”年代，我不同意“吃饭不要钱”的做法，被批成是反对三面红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研究室的非党群众写了一张向党组织提建议的大字报，被打成大毒草；在“四人帮”横行期间，对江青等人的言论有不同的看法，对最高指示也不理解，甚至还要与极左分子进行辩论，被好心的领导劝阻才作罢。当时，我感到困惑和迷惘。人家说我这个人工作还可以，思想不行。

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人们重新审视了我十几年的言行，发觉我这个人还行。于是，1978年，我当上第五届全国青联委员，1979年入党，1982年后历任国际贸易研究所副处长、处长、副所长、所长。1997年，担任了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党委书记和院长。期间，1990年到1994年，我被派往日本东京，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负责对日本经济商务工作。我感谢邓小平，没有邓小平拨乱反正，就没有我的今天。

其实，我并不喜欢当行政领导，而是喜欢从事研究工作。行政事务再忙，也要忙里偷闲搞点研究。原来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日本经济和中国对外经贸问题。我经常写一些论文，主编一些书籍，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参与或主持课题研究，有时还在电视台专题节目中谈一些热门经济话题。

也许是严谨治学的位育校风培养了我善于独立思考和认真做事的习惯，我在研究工作中也不爱人云亦云。1994年开始，我对我国外贸企业搞实业化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误以为日本和韩国等的综合商社是搞实业化、多元化的典型，把推行综合商社试点作为外贸企业改革的一付灵丹妙药。但我却不识时务地对当时的搞综合商社热泼了冷水，并且认为，外贸企业实业化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1995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与贸易工作组中方成员，这使我在国际贸易的研究领域发生了变化，从日本经济贸易逐渐转到环境与贸易问题方面的研究。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现象，即环境因素正在使产品竞争力的内涵发生新的重要变化。1999年年初，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产品的环境竞争力，并且阐述了决定环境竞争力的因素、评价环境竞争力的方法，以及对培育我国产品竞争力的建议。后来，我在2002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年会上又提出了关于新贸易壁垒的概念，并就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标准化与国际贸易等问题进行了研究。